

留守经历大学生童年期创伤的影响因素

徐滨^{1,2}, 宋倩³, 张建华⁴, 郝爱云⁵, 马因⁶, 张瑞霞⁷, 赵宏祥⁸, 陈伟⁹

1.天津师范大学心理学部, 天津 300387; 2.天津科技大学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 3.天津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4.天津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工作部; 5.天津国土资源和房屋职业学院心理健康辅导中心; 6.天津工业大学艺术学院; 7.天津体育学院体育经济与管理学院; 8.天津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中心; 9.天津美术学院心理健康教育发展中心

【摘要】 目的 探讨留守经历大学生童年期创伤的影响因素, 为有效干预留守经历对个体的负性影响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方法, 抽取天津 5 所高校和 2 所高等职业院校的 2 468 名学生, 使用自编问卷和童年期创伤问卷开展调查。**结果** 留守经历学生在情感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躯体忽视和童年期创伤总分上高于无留守经历学生(t 值分别为 3.01, 3.13, 3.24, 2.27, 3.60, P 值均 <0.05); 父母外出情况和父母回来频率对留守经历大学生童年期创伤总分存在交互作用($F=2.37, P<0.05$); 性别与生源、父母外出时对象年龄、父母外出累积时间和同父母联系频率的交互作用下对留守经历学生童年期创伤总分主效应均有统计学意义(F 值分别为 4.49, 5.23, 5.93, 5.11, P 值均 <0.05); 父母离家时对象年龄与生源、性别、是否独生、父母外出情况和父母回来频率的交互作用下, 以及同父母联系频率与生源、性别、是否独生和父母外出累积时间的交互作用下主效应均有统计学意义(F 值分别为 3.88, 4.25, 3.32, 2.86, 3.45; 3.82, 4.02, 2.64, 3.29, P 值均 <0.05)。**结论** 有必要高度重视相关人口学和留守信息对留守经历学生身心健康的影响, 以更有针对性地开展相应预防和治疗工作。

【关键词】 精神卫生; 创伤和损伤; 方差分析; 问卷调查; 学生

【中图分类号】 G 444 B 844.2 G 647.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20)06-0889-04

Determinants of childhood trauma among college students with left-behind experience/XU Bin^{*}, SONG Qian, ZHANG Jianhua, HAO Aiyun, MA Nan, ZHANG Ruixia, ZHAO Hongxiang, CHEN Wei. ^{*} Faculty of Psychology,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determinants of childhood trauma among college students with left-behind experience, an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effective intervention among students with left-behind experience. **Methods** A total of 2 468 students selected from 5 universities and 2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tianjin by stratified cluster sampling method were investigated by self-compiled questionnaire and 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 **Results** The scores in emotional abuse, sexual abuse, emotional neglect, physical neglect and childhood trauma of students with left-behind experience were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ose without left-behind experience($t=3.01, 3.13, 3.24, 2.27, 3.60, P<0.05$); parental separation times and the frequency of parental return had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effect on the total score of childhood trauma of students with left-behind experience ($F=2.37, P<0.05$); the gender had a significant major effect on the total score of childhood trauma of students with left-behind experience under the interaction with the place of origin, age at first separation, the cumulative time of left-behind experiences and the frequency of parents contacting ($F=4.49, 5.23, 5.93, 5.11, P<0.05$); the age of subjects when parents going out under the interaction with the place of origin, the gender, if only-child, parental separation times and the frequency of parental return; as well as the frequency of parents contacting under the interaction with the place of origin,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the gender, if only-child and the cumulative time of left-behind experiences also had significantly main effect($F=3.88, 4.25, 3.32, 2.86, 3.45; 3.82, 4.02, 2.64, 3.29, P<0.05$). **Conclusion** It is necessary to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demographic and context information regarding left-behind experiences, which lead to more specific and effective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y for individual with left-behind experiences.

【Key words】 Mental health; Wounds and injuries; Analysis of variance; Questionnaires; Students

留守经历与负性情绪和行为显著相关^[1-3], 关于

两者联系的心理机制, 童年期创伤经历被广泛关注^[4-8]。不同个体的留守经历会导致不同程度的创伤体验, 最终对个体的心理行为造成不同的影响。Bronfenbrenner 等^[9]曾提出过社会环境影响心理发展的“生态系统理论”, 模型是以个体为中心的多重同心圆组成的套嵌系统, 自外向内依次是社会变迁构成的“时间系统”、社会环境构成的“宏系统”、家庭和社区

【基金项目】 2018 年天津市学校心理健康教育课题项目(XLZX-G201804)。

【作者简介】 徐滨(1981-), 男, 辽宁大连人, 在读博士, 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心理与行为的脑科学。

DOI: 10.16835/j.cnki.1000-9817.2020.06.024

环境构成的“外系统”、家长及学校和同伴与个体互动构成的“中系统”和“微系统”。参考这一模型,可以将目前中国社会的转型期视为时间系统,将大量剩余劳动力流动所造成的留守现象视为“宏系统”,将子女所在的留守环境视为“外系统”,将留守期间父母与子女特定的互动方式视为“中、微系统”,将个体所体验的童年期创伤视为这种层层传递的作用结果。本研究通过调查天津市部分高校和高等职业院校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人口学信息(外系统)、留守期间和父母的互动信息(中、微系统)以及童年期创伤情况,探讨它们之间的关系,为有效干预留守经历对个体的负性影响提供参考。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于 2018 年 3—5 月,以天津市 5 所高校(2 所双一流综合性大学、1 所为普通综合性大学、2 所普通专业性学院)和 2 所高职(以理工专业和文法经管专业为主的学校各 1 所)为采样点。抽样前,对 7 所学校的专业和年级分布进行了解,确保抽样的平衡性。抽样时,以班级为单位,采取现场网上作答的方式进行分层整群抽样。所有人被事先告知测试目的、内容并承诺严格保密,获得知情同意后以匿名方式,手机扫码进入统一的测试平台答题,施测人员事先接受统一培训并使用统一的指导语,规定在 20 min 答完问卷并提交。

抽样结束共收回 3 368 份问卷,删除信息不全、选择性作答及前后信息不一致的无效问卷,最终得到有效问卷 2 468 份,有效率为 73.28%。按留守经历的划分标准^[10-11],有留守经历者 748 名(30.31%),无留守经历者 1 720 名(69.69%)。两组学生学制、生源地、户籍、性别、是否独生分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 值分别为 6.52, 148.64, 253.00, 11.81, 131.06, P 值均 < 0.05)。

1.2 调查工具

1.2.1 自编量表 自编量表包括 3 部分:一是被试所在的学校、学院和班级信息(填空题),便于对各单位的采样情况进行统计;二是被试的生源地、户籍、性别和是否独生子女 4 项人口学信息(选择题);三是有关被试留守经历的 6 个项目(选择题),即(1)父母是否在 16 岁(含)以前有过外出务工的情况(是、否共 2 个选项),(2)父母哪一方有这样的情况(无、父、母、父母双方共 4 个选项),(3)父母最早外出务工时你几岁(无、<3 岁、3~5 岁、6~14 岁、 ≥ 15 岁共 5 个选项);(4)父母外出务工累积的时间(无、3~<6 个月、6~<12

个月、12 个月及以上共 4 个选项);(5)父母外出务工时你联系的频率(无、每天 1 次、<1 次/d 而 ≥ 1 次/周、<1 次/周而 ≥ 1 次/月、<1 次/月共 5 个选项);(6)父母外出务工多久回来 1 次(无、<3 个月、3~<6 个月、6~<12 个月、12 个月及以上共 5 个选项)。为了便于对被试是否认真作答进行筛查,当项目(1)回答“否”时,后面的 5 个项目应该都回答“无”;或当项目(1)回答“是”时,后面的 5 个项目不应该回答“无”,否则被视为不认真作答,其信息不被纳入研究。

1.2.2 童年期创伤 采用《童年期创伤问卷(简短版)》(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28 Short Form, CTQ-SF)^[12] 评估大学生 16 岁以前经历各种创伤的情况。该问卷由美国临床心理学家于 1998 年编制,并在 2003 年重新修订,为回顾性自陈问卷,共 28 个项目,包含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和躯体忽视 5 个因子,所有项目按 Likert 5 点记分,5 个因子得分相加后得到总分,各因子及总分越高表示童年期创伤情况越严重。赵幸福等^[13] 将其译为中文,并以 819 名高中生为被试,发现中文版量表有较好的信效度, Cronbach α 系数为 0.77。本研究中量表 Cronbach α 系数为 0.75。

1.3 统计分析 所有数据通过测试平台以 Excel 文件格式导出。使用 SPSS 25.0 进行统计分析。首先,对是否有留守经历的两组学生的各项人口学信息分布做 χ^2 检验;并对童年期创伤问卷总分及各因子得分做独立样本 t 检验。其次,对有留守经历学生群体的童年期创伤总分做各项人口学信息和留守相关信息的多因素方差分析;对存在交互作用的 2 个变量进一步做简单效应分析。最后,对多因素方差分析主效应有统计学意义的单个变量做独立样本 t 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水准 $\alpha = 0.05$ 。

2 结果

2.1 有无留守经历学生童年期创伤水平比较 由表 1 可见,除躯体虐待因子外,有无留守经历学生情感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躯体忽视 4 个因子得分以及童年期创伤总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值均 < 0.05),且有留守经历的学生得分均高于无留守经历的学生。

2.2 有留守经历学生各项人口学及留守相关信息对童年期创伤得分的交互效应检验 仅父母外出人数与父母回来频率之间的交互作用有统计学意义($F = 2.37, P < 0.05$),而其余各项信息之间的交互作用无统计学意义(P 值均 > 0.05)。

表 1 有无留守经历在学生童年期创伤得分比较($\bar{x}\pm s$)

组别	人数	情感虐待	躯体虐待	性虐待	情感忽视	躯体忽视	童年创伤总分
有留守经历	748	6.48±2.26	5.65±1.77	5.47±1.58	9.15±4.17	7.51±2.89	34.26±9.52
无留守经历	1 720	6.19±2.15	5.55±1.80	5.27±1.27	8.52±5.05	7.22±2.95	32.75±9.67
<i>t</i> 值		3.01	1.20	3.13	3.24	2.27	3.60
<i>P</i> 值		<0.01	0.23	<0.01	<0.01	0.02	<0.01

由表 2 可见,当父母回来频率较大时(<3 个月和 3~<6 个月),不同的父母外出情况间童年期创伤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值均>0.05),但母亲外出时的童年期创伤总分最高。当父母外出回来频率变小时(6~<12 个月),不同的父母外出人数水平间童年期创伤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但母亲外出时的童年期创伤总分也变得最低,且父母同时外出的童年期创伤总分高于父亲或母亲单独外出。当父母外出回来频率继续变小时(12 个月及以上),不同父母外出人数水平间童年期创伤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母亲外出时的童年期创伤总分仍然最低。

表 2 不同父母回来频率下留守儿童父母外出情况间童年期创伤得分比较($\bar{x}\pm s$)

父母外出情况	人数	<3 月	3~<6 月	6~<12 月	12 月及以上
父亲外出	304	33.77±9.01	32.11±6.85	33.44±9.45	34.00±10.90
母亲外出	34	37.53±8.67	37.46±11.03	29.29±2.69	27.00±2.83
父母外出	407	33.11±9.09	33.94±10.18	36.63±9.44	38.10±13.83
<i>F</i> 值		1.56	2.49	4.27	1.05
<i>P</i> 值		0.21	0.09	0.02	0.36

2.3 有留守经历学生各项人口学及留守相关信息对童年期创伤得分的主效应检验 性别在与生源地、父母外出时对象年龄、父母外出累积时间、同父母联系频率交互时主效应均有统计学意义(*F* 值分别为 4.49, 5.23, 5.93, 5.11, *P* 值均<0.05),事后比较发现,男性童年期创伤总分高于女性(*P*<0.05)。父母外出时对象年龄在与生源地、性别、是否独生、父母外出数量、父母回来频率交互时主效应均有统计学意义(*F* 值分别为 3.88, 4.25, 3.32, 2.86, 3.45, *P* 值均<0.05),事后比较发现,在<3 岁时父母外出的童年期创伤总分高于在 3~5 岁时、6~14 岁时及≥15 岁时父母外出(*P* 值均<0.05);而后 3 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值均>0.05)。同父母联系频率在与生源地、性别、是否独生、父母外出累积时间交互时主效应均有统计学意义(*F* 值分别为 3.82, 4.02, 2.64, 3.29, *P* 值均<0.05),事后比较发现,同父母联系频率<1 次/d 而≥1 次/周的童年期创伤总分低于<1 次/周而≥1 次/月和<1 次/月(*P* 值均<0.05),其余各组间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 值均>0.05)。

3 讨论

有留守经历学生中西部生源、乡村户籍、非独生子女比例均高于无留守经历者,与以往的研究结果相一致^[4,14-15],表明留守经历学生成长的社会环境(外系统)具有其特殊性。有留守经历学生中专科比例更高,则从侧面上印证了留守经历对学业成绩的负面影响^[16]。

有留守经历学生童年期创伤得分(除躯体虐待)高于无留守经历者,说明创伤经历的增加与留守儿童特殊的家庭环境有直接关系^[17-18],其最显著特征是早年的亲子分离。儿童早年安全感的基础是与抚养者间良好的依恋关系,为个体的身心发展提供一种保护性的作用^[19],而依恋的主要对象是父母^[20]。留守期间的亲子分离将会造成这种保护性关系的中断和破坏,使个体在遭遇各种创伤事件时失去依靠和缓冲。有研究发现,低安全感的留守儿童对社会生活事件有更多的负性编码行为^[21]。另外,亲子分离还会造成与父母间情感沟通的匮乏^[4],使个体在成长的关键期失去向父母学习情绪表达和情绪调节的机会^[22],导致他们对创伤事件有更多的负性评价和体验,以及更高的童年期创伤发生率^[23]。再者,因为亲子分离而导致的各种资源及社会支持的匮乏^[24],也会增加个体遭遇各类创伤的风险^[25]。

父母外出情况和父母回来频率对有留守经历大学生的童年期创伤得分存在交互作用。母子间安全依恋建立的更早,母亲在子女早期成长过程中的支持和引导作用也更为重要^[20]。如果母亲单独外出并且回来频率较高时,会对家庭关系扰动更大,使孩子频繁适应这种变化,无法充分体验安全感和稳定感,也很难从创伤中调试和复原,创伤总分表现为最高。当母亲单独外出的频率变小时,创伤总分反而变得最低,可能与孩子有更长的适应时间以及开始尝试建立其他的安全关系有关。需要注意的是,父母回家频率在 12 个月及以上者仅有 47 名,占全部留守经历学生的 6.28%,过少的人数会增大其内部各亚组童年期创伤分布的离散趋势。

本研究显示,留守经历学生中男性童年期创伤总分高于女性。陈旭^[26]发现,男女留守儿童在亲子安全依恋和社会支持得分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是女童心理弹性得分却高于男童。心理弹性也被认为是个

体应对创伤事件时一种非常重要的保护性因素^[27-28]。另外,女生更喜欢情感表达和倾诉,从而比男生更容易获得支持和帮助^[29]。需要注意的是,无留守经历学生中男性比例偏小,可能会对有无留守经历学生间童年创伤得分的比较造成影响。本研究显示,父母在<3岁外出时,童年期创伤总分高于在其他3组时间外出。<3岁是孩子与父母形成安全依恋的关键时期,此时与孩子分离将会对其安全感和稳定感的建立非常不利^[20]。有研究发现只要是早年与父母分离,无论留守时间长短,都会对其行为和情绪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3]。关于<1次/d而≥1次/周的联系频率下童年期创伤总分相对更低。说明保持适当的联系频率,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和抵消分离所带来的安全感缺失,又可以避免因父母频繁介入而对孩子适应留守期间生活所造成干扰。

综上,需要在留守经历学生的干预治疗中格外重视性别、父母外出情况、父母回来频率、父母离家时个体年龄、同父母联系频率等因素。但研究尚存在一些局限:(1)回顾性研究无法准确考察被试经历留守和童年创伤的先后顺序;(2)涉及诸多敏感信息会造成被试回顾时的偏倚;(3)被试的选择范围仅限于天津地区的大学生,且性别没有被更好的平衡。今后需要在更大范围内、采用队列研究的方式,并考虑选用多种手段对童年期创伤、人口学及留守相关信息间的关系做更长周期和更细致深入的探讨。

4 参考文献

- [1] 朱玲.具有童年期留守经历大学生的成人依恋和人际敏感的研究与干预[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4.
- [2] 罗静,王薇,高文斌.中国留守儿童研究书评[J].心理科学进展,2009,17(5):990-995.
- [3] 凌辉,张建人,易艳,等.分离年龄和留守时间对留守儿童行为和情绪问题的影响[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2,20(5):674-678.
- [4] 张培宁.曾留守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D].广州:南方医科大学,2016.
- [5] 杨雪岭,冯现刚,崔梓天.大学生的留守经历与心理韧性、心理病理症状[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4,28(3):227-233.
- [6] 王立菲,宋长海,王向丽,等.留守经历新兵状态-特质抑郁与情绪调节方式、儿童期创伤的关系[J].第三军医大学学报,2018,40(19):1735-1740.
- [7] 刘衍华.父母教养方式在农村留守儿童创伤经历与健康危险行为关系中的调节作用[J].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18,26(7):712-716.
- [8] 廖斌.新世纪文学现代性转型视阈中的留守儿童及其留守经验[J].临沂大学学报,2013,35(1):72-77.
- [9] BRONFENBRENNER U, MORRIS P A. The bioecological model of human development[M]//LERNER R M, DAMON W. handbook of child psychology: theoretical models of human development. Hoboken, New Jersey, US: John Wiley & Sons Inc, 2006: 793-828.
- [10] 李艳兰,刘丽娟,杨军.有留守经历大学生问题行为与消极情绪和积极人格品质的关系[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9,33(4):318-320.
- [11] 干璐璐,杨盈,张兴利.阈上安全感启动对有留守经历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影响[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18,32(11):947-953.
- [12] BERNSTEIN D P, STEIN J A, NEWCOMB M D, et al.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brief screening version of the 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J]. Child Abuse Neglect, 2003, 27(2): 169-190.
- [13] 赵幸福,张亚林,李龙飞,等.中文版儿童虐待问卷的信度和效度[J].中国临床康复,2005,9(20):105-107.
- [14] 李福轮,乔凌,贺婧,等.国内留守儿童《心理健康诊断测验》近十年调查结果的 Meta 分析[J].中国儿童保健杂志,2017,25(5):493-495.
- [15] 王意.“儿时留守”大学生和谐交往能力提升研究[D].南昌:江西农业大学,2014.
- [16] 周奎奎,孙晓军,刘亚,等.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发展与教育问题[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42(1):71-79.
- [17] 赵兰,唐娟,李科生.留守未成年犯攻击性与社会支持、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相关研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1,19(6):790-791.
- [18] 余应筠,敖毅,石水芳,等.不同类型农村留守儿童生活事件及家庭影响因素[J].中国公共卫生,2013,29(3):339-342.
- [19] 高娇.鲍尔比的依恋理论简介及其现实意义[J].社会心理科学,2012(6):16-20,87.
- [20] 张玉沛.情感联结的意义-约翰·鲍尔比依恋理论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2.
- [21] 廖传景.留守儿童安全感研究[D].重庆:西南大学,2015.
- [22] THOMPSON R A. Emotion regulation: a theme in search of definition [J]. Monogr Soc Res Child, 1994, 59(2/3): 25-52.
- [23] KHOSRAVANI V, MESSMAN-MOORE T L, MOHAMMADZADEH A, et al. Effects of childhood emotional maltreatment on depressive symptoms through emotion dysregulation in treatment-seeking patients with heroin-dependence [J]. J Affect Disord, 2019, 256: 448-457. DOI:10.1010/j.jad.2019.06.021.
- [24] 高文斌,王毅,王文忠,等.农村留守学生的社会支持和校园人际关系[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7,21(11):791-794.
- [25] HORAN J M, WIDOM C S. From childhood maltreatment to allostatic load in adulthood[J]. Child Maltreat, 2015, 20(4): 229-239.
- [26] 陈旭.留守儿童的社会性发展问题与社会支持系统[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300.
- [27] BONANNO G A. Resilience in the face of potential trauma [J]. Curr Dir Psychol Sci, 2005, 14(3): 135-138.
- [28] 阳毅,欧阳娜.国外关于复原力的研究综述[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06,14(5):539-541.
- [29] 曾守锤,李其维.儿童心理弹性发展的研究综述[J].心理科学,2003(6):1091-1094.

收稿日期:2019-12-11;修回日期:2020-03-25